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 107–11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0107

老者智否？成人智慧与年龄的关系*

王予灵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智慧与年龄的关系是智慧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青少年时期及成年早期是智慧的萌发期为多数学者所公认，但在成年期个体的智慧与年龄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尚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主要有增长论、衰减论、稳定论、高原论四大观点，前两者的实证支持较少，后两者则有着较丰富的实证依据。在对上述理论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认为实证层面有三项任务最为紧迫、理论层面有六大问题值得探讨，并提出了基于"个体–情境"差异的"智慧–年龄"关系理论，试图为智慧与年龄的关系问题提供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智慧；年龄；成人发展；老龄化；智慧发展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尽管心理学界对智慧的本质("智慧究竟意味着什么")尚无统一意见(汪凤炎, 郑红, 2015; Weststrate, Ferrari, & Ardelt, 2016)，但已有学者指出(Webster, Westerhof, & Bohlmeijer, 2014)当代心理学对智慧的基本定义已渐趋一致：智慧是一种复杂的多维构念，源自对人生经验的价值性反思，智慧不仅有利于个人成长，而且有助于增益人世间的"共善" (共同利益, common good)。陈浩彬和汪凤炎(2013)在梳理 8 种主要的智慧定义时发现，各家定义虽表述不一，但都暗含着"德才兼备方是智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 (现称"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1])，主张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由聪明才智和良好品德两大成分构成。与智力不同，智慧概念中天然地蕴含着"善" (汪凤炎, 郑红, 2015)，智慧对人类(个体自身和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杨世英, 2008)，与诸多积极的心理变量(如：心理健康、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掌控感及心理韧性)存在正相关(Thomas, Bangen, Ardelt, & Jeste, 2017)。透彻研究智慧"既能帮助积极入世的个体获得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就，也能帮助广大民众过上幸福的生活" (汪凤炎, 郑红, 2015, p.154)。长期以来，在智慧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研究中，智慧与年龄(或：智慧的毕生发展问题)一直是智慧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要关切(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Ardelt & Oh, 2016)。深入研究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对讨论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因素(如何生成、发展智慧)及智慧测量、智慧教育均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研究者已对智慧与年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Staudinger, 1999; Sternberg, 2005; Brugman, 2006; Meacham, 1990; Jordan, 2005; Richardson & Pasupathi, 2005)和实证检验(Smith, Staudinger, & Baltes, 1994; Staudinger, Smith, & Baltes, 1992; Baltes, Staudinger, Maercker, & Smith, 1995; Ardelt, 2010; Bergsma & Ardelt, 2012; Webster et al., 2014; Jeste & Oswald, 2014; Cheraghi, Kadivar, Ardelt, Asgari, & Farzad, 2015)。青少年时期及成年早期是智慧的萌发期(the seeds of wisdom)，此阶段(约 13~24 岁)的个体对智慧相关知识(wisdom-

收稿日期：2017-03-17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6 年度重大项目(16JJD880026)；2017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17_1020)。
通信作者：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1] "德才一体"较"德才兼备"更为明确，是汪凤炎 2014 年 6 月以来对其智慧理论的新概括。"兼备"一词仅指涉"德""才"两种成分兼有，未必能保证二者"合一"；相比之下，"德才一体"更能体现智慧的本质。

related knowledge)的积累迅猛增加(Jordan, 2005), 其智慧呈逐年增长趋势, 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Sternberg, 2005; Brugman, 2006)。

然而, 关于成年期个体的智慧与年龄的关系, 则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及实证差异。Sternberg (2005)概述了五大观点[2]: “(公众)广泛接受”的观点("received" view)、“流体智力”的观点("fluid intelligence" view)、“晶体智力”的观点("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view)、“混合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观点(both fluid and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衰减”的观点, 并提出了“个体差异”的观点; Jordan (2005)总结了三大模型: 增长模型(Positive Model)、衰减模型(Decline Model)、晶体模型(Crystallized Model)。综合二人的论述, 结合新近研究, 对于成年期个体, 本文将智慧与年龄的关系概括为如下四大观点: 增长论, 认为智慧伴随年龄不断增长(在统计上表现为智慧与年龄正相关); 衰减论, 认为智慧随年龄不断衰减(在统计上表现为智慧与年龄负相关); 稳定论, 认为智慧与年龄无直接联系, 智慧随年龄保持稳定; 高原论, 认为智慧与年龄呈非线性关系, 智慧在成年早期开始增长, 在中老年时期达到顶峰, 随后开始下降。在实证领域, 早期研究(主要来自柏林智慧范式)为稳定论提供了大量支持, 新近研究则为高原论提供了一定支持; 增长论的实证支持较少, 衰减论则缺乏实证支持。

本文试图基于既有研究结果, 进一步探讨成年期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先后介绍了增长论、衰减论、稳定论、高原论的主要观点及支持证据, 并作出了简要评价。在此基础上, 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设想, 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探讨的问题, 并基于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和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五因素交互作用论概括出了基于“个体−情境”差异的“智慧−年龄”关系理论。

2 增长论

增长论类似于 Sternberg (2005)总结的“(公众)广泛接受”的观点、Jordan (2005)的增长模型和 Meacham (1990)所谓传统观点(traditional perspective)。该观点认为智慧与年龄呈正相关, 智慧逐年增加。增长论多为常人所持有。旨在测查普通人(lay people)如何理解“智慧意味着什么”的智慧内隐理论研究(Weststrate et al., 2016)发现: 普通人常将智慧与老年联结在一起(Glück & Bluck, 2013)。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 智慧者往往以老者的形象浮现于脑海, 老年人因其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被认为更具智慧。然而, 普通人所持的“智慧与年龄相关”的观点, 仅仅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智慧观, 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如此(Jordan, 2005), 不能作为支持增长论的证据。

在专家的智慧观中, 早在哲学心理学时代, 孔子即持有一种神似“增长论”的看法: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杨伯峻, 2009, p.12)。在现代心理学界, 明确支持增长论的当属埃里克森(Erikson, 1963)。埃里克森认为智慧与年龄关系密切, 在其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 智慧是个体在第八阶段(成年后期, 65 岁至死亡, late adulthood)成功克服发展危机(自我整合对绝望, ego integrity vs. despair)的产物。尽管埃里克森从未否认智慧可以更早地产生, 但论者常常认为: 据其观点, 个体的智慧往往在生命周期的第八个阶段才会出现(Sternberg, 2005), 在时间上有“太晚之嫌” (汪凤炎, 郑红, 2014, p.138)。由于实证支持的缺乏, 在智慧心理学领域, 除新皮亚杰主义(Labouvie-Vief, 1990; Sinnott, 1998)外, 鲜有后继者持有增长论的观点。直到最近, 才有老年神经精神病学家(geriatric neuropsychiatrist) Jeste 及其同事(Jeste & Oswald, 2014)对增长论给予鲜明的支持。

2.1 支持增长论的直接证据

目前, 直接支持增长论的实证结果甚少, 仅见 Wink 和 Helson (1997)进行的一项有关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与灵性智慧(transcendent wisdom)的纵向研究[3]。为操作之便, 在智慧定义上, 该研究主要参照了 Achenbaum 和 Orwoll (1991)的

[2] 需指出, Sternberg 概述的“流体智力”的观点、“晶体智力”的观点、“混合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观点, 并不是说“智慧就是流体智力/晶体智力/混合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某种能力”, 而是意指智慧随年龄发展的轨迹(track)与之类似。

[3] 一些中国台湾学者(张仁和, 林以正, 黄金兰, 2014)曾将 Grossmann 等(2010)的研究作为支持“老而智” (“年岁的增长也带动智慧的增长”)的直接证据, 本文则在 2.2 小节将之归为支持“增长论”的间接证据, 这是由于: Grossmann 等(2010)测量的实际上是社会推理能力而非智慧本身。

观点：将智慧区分为个体内、个体间以及超个体三个领域, 每个领域的智慧都需要情感的(affective)、认知的(cognitive)、意动(conative)的发展作为基础。Wink 和 Helson (1997)认为实践智慧主要与对个体间领域的兴趣和技能(同感, 理解, 关系的成熟)有关, 而灵性智慧主要与对超个体领域的兴趣和技能(自我超越, 对知识局限性的认识, 哲学的/心灵的承诺)有关。研究者采用自评式问卷(题项筛选自形容词检查表, Adjective Check List, ACL)测查了 138 名(94 女, 44 男)被试在 25 年间的智慧发展状况(初测年龄：女性 27 岁, 男性 31 岁; 再测年龄：女性 52 岁, 男性 56 岁), 结果发现：灵性智慧不适合进行分析, 而在实践智慧上,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智慧均随年龄显著增加。特别地, 与非临床心理学家相比, 临床心理学家的智慧随年龄增长的趋势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实践智慧至少在成年早期至成年中期呈上升趋势, 生命经验的积累与此有密切的关系(Wink & Helson, 1997)。然而, Wink 和 Helson 对实践智慧的测量太过接近人格测验, 他们测到的很可能只是“人格成熟”, 因此不难理解 Jordan (2005, p.161)为何未将其视为支持增长模型的证据。

2.2　支持增长论的间接证据

Jeste 和 Oswald (2014)梳理了一些间接支持增长论的实证依据。他们将智慧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特质(complex trait), 该特质与受经验驱动(experience-driven)的高级认知、情绪发展紧密相关, 并认为社会推理(social reasoning)、决策(decision making)、情绪管理(emotional regulation)和积极性(positivity)、灵性(spirituality)以及果断(decisiveness)是智慧的主要成分。

相应的实证研究表明：(1)成年期个体的流体智力尽管在逐年衰退, 但其社会推理能力似乎在逐年提高(Grossmann et al., 2010)。(2)年轻人会更迅速地做出能带来即时满足的选择, 老年人则在决策中利用其丰富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长远的利益, 而非即时的效益(Worthy, Gorlick, Pacheco, Schnyer, & Maddox, 2011)。(3)老年人在情绪管理和积极性上也有更好的表现, 无论是面对积极事件还是消极事件, 均能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乐观情绪(Röcke, Li, & Smith, 2009); 老年人体验到更少的负性情绪, 并能更有效地管理情绪(Read & Carstensen, 2012)。(4)加州伯克利大学进行的一项长达 70 年的纵向研究显示：自中年后期(late mid-life)始, 灵性逐年显著增加(Wink & Dillon, 2002)。(5)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在与不确定性打交道时, 感觉更为轻松自在(Blanchard- Fields, 2007)。

Jeste 和 Oswald (2014)总结了支持增长论的三大神经基础。首先, 补偿性改变(Compensatory Changes)。fMRI 及 PET 研究已表明老年脑的一些改变似乎补偿了老年化历程中的一些损失, 因此在脑机能上对一些表现出高智慧的老年人有所助益。例如, 老年人脑后区的激活虽然较低, 但脑前区的激活显著高于年轻人, 此种改变被称为“伴老年化的后侧−前侧转换” (Posterior- Anterior Shift with Aging, PASA) (Dennis & Cabeza, 2008)。据此, 高智慧的老年人或许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的可塑性改变来抵消认知逐年衰退的不利影响(Jeste & Oswald, 2014)。其次, 突触及神经发生(Synaptogenesis and Neurogenesis)。脑结构成像研究显示：认知的成功老年化(successful cognitive aging)与更大的神经结构及更强的神经连接关系密切, 并突出表现在前额叶和内侧颞叶区域(Kaup, Mirzakhanian, Jeste, & Eyler, 2011)。最后, 情绪响应上的脑功能改变(Functional Brain Changes in Emotional Responsivity)。研究发现, 对于老年人, 杏仁核与海马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下降, 而杏仁核与背外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则显著增加(St. Jacques, Bessette-Symons, & Cabeza, 2009)。Jeste 和 Oswald (2014)认为, 上述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如下观点：老年化不仅仅意味着脑功能的损失, 相反, 由最佳身心刺激促发的神经可塑性是增长论的潜在神经基础。

2.3　评价

由于缺乏丰富有力的实证支持, 自埃里克森之后, 除新皮亚杰主义学派外, 心理学界几乎无人支持智慧与年龄的增长论。现有的支持增长论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 Jeste 和 Oswald (2014)为增长论寻求了一些可靠的间接证据,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然其弊亦在“间接”二字, 所给证据太过间接, 无法令人信服, 不能为增长论提供强力支持。(2) Wink 和 Helson (1997)的早期研究为增长论提供了仅有的直接证据, 显得孤木难支。且其研究取样的年龄范围过窄, 最小者已 27 岁, 最大者才 56 岁, 不能充分揭示智慧与年

龄的关系。此外，从理论上讲，纯粹的增长论也有一定弊端。增长论往往强调积累生命经验的重要性，但经验本身并不足以生成智慧(Staudinger, 1999; Glück & Bluck, 2013)。同时，由于智慧中“聪明才智”这一成分需要一定的生理基础，因此智慧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老年期临近死亡的数年，伴随着认知能力的严重衰退)。

3 衰减论

衰减论类似于 Sternberg (2005)总结的“衰减”的观点与 Jordan (2005)的衰减模型，该观点认为智慧与年龄呈负相关，自生命早期智慧便开始逐年衰退。该观点由 Meacham (1990)提出，几乎无人响应，亦无实证支持。

3.1 主要观点

Meacham (1990)认为，智慧的本质是持有一种“认为知识是不可靠的(knowledge is fallible)”的态度，并努力寻求一种在确知(knowing)与怀疑(doubting)之间的平衡。Meacham 从关于科学的哲学、关于确知的个体发生学以及关于智慧的哲学等角度搜集了文献证据，以支持其对智慧的界定。随后，在提出衰减论之前，Meacham 首先分析了为何常人持有“增长论”的观点：(1)观察的偏差。我们对智慧出现率(incidence of wisdom)的观察不充分，更倾向于观察到老年人的智慧。(2)归因的偏差。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年轻人往往对老年人持有一种“老而无用” (认知能力衰退)的刻板印象，但当观察到其不凡的表现时，则归因于“智慧”。(3)信任的偏差。年轻人在面临种种人生挑战时，有向经验丰富的年长者求助的需要，因此年轻人在情感上需要相信这些年长者是“智慧”的。此外，Meacham 还提出了一个方法学上的认识论问题：大部分研究智慧的学者仍处在成年早期或中期，依增长论看，是不够智慧的。这些不够智慧的研究者如何能可靠地撰写智慧主题的文章？

Meacham 认为其提出的“衰减论”可以解决“增长论”存在的认识论难题。他假定人们在儿童阶段十分智慧，但随着长大、变老，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失去了智慧(仅有少部分人保持了智慧)。他以所罗门王的轶事及一位少女在 13~15 岁时的日记作为论据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最后，为解释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智慧表现形式的差异，Meacham 建立了一个智慧的二维结构(如图 1 所示)。他认为第一个维度不是一个发展的维度，表征着智慧的本质，亦即：认为知识是不可靠的，在确知与怀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第二个维度则是一个发展的维度，未表征智慧的本质，仅代表智慧的品质，或简单，或深远，该维度与信息、经验、洞察的积累有关。以此观之，尽管儿童在智慧的品质维度可能处于“简单”水平，但在本质维度上较成人更为纯粹，往往恰好处于“知”与“疑”的平衡点；相比之下，虽然成人在品质维度上比儿童“深远”，但在本质维度上偏向两极：或过“知” (教条主义)，或过“疑” (怀疑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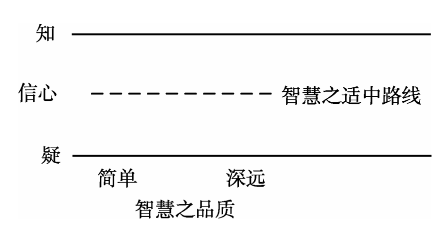


图 1 智慧的二维空间 (资料来源：Meacham, 1990, p.202)

智慧为何会在成年期衰减？Meacham 认为只要偏离了“知”与“疑”的平衡就意味着智慧的衰减，并提出了 4 种导致衰减的因素：(1)积累(accumulation)。年岁增长一般会为个体带来更多的信息和经验、更大的权势和成功，这种积累往往会使个体过于自信其“知”，从而增加丧失智慧的风险(图 1 中偏于右上方)。(2)刻板印象及偏执(stereotyping and intolerance)。随着年岁的增长，受社会氛围的影响而遵从刻板印象，个体盲信其“知”，放弃对模糊、矛盾事物的深入思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智慧(图 1 中偏于左上方)。(3)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现代人在成年期往往会经历较为剧烈的时代变迁(无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随着年岁的增长，过去的某些知识、经验可能不再可靠，个体因而对其“所知”的价值产生严重的怀疑，最终丧失智慧(图 1 中偏于右下方)。(4)悲剧(Tragedy)。相比儿童和青少年，中老年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经受了更多的悲剧(如：威胁生命的慢性疾病、亲友的逝世、某种生活方式的丧失)，在这些悲剧的打击下其意义建构体系濒临崩溃，失去“知”的信心转而怀疑一切(图 1 中偏于左下方)。

3.2 评价

衰减论十分有趣(Sternberg, 2005)，可以感受到 Meacham 的思想部分源自老子，有一种 “常德

不离，复归于婴儿”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的味道在里面。但 Meacham 将智慧定义为“持有一种认为‘知识是不可靠的’的态度，并力求一种在‘知’与‘疑’之间的平衡”，似乎严重窄化了智慧的内涵，其否定增长论的证据并不能直接支持衰减论，而直接论证衰减论的论据又显得不够充分。此外，他提出的 4 种衰减因素虽与其智慧二维模型形成了完好呼应，却忽视了 4 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依其理论，若 4 种因素并存，又将使个体的智慧置于二维模型的哪一位置？Meacham 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大大降低了衰减论的说服力。以上或许正是近 30 年来无人拥簇衰减论的主要原因。

4　稳定论

稳定论类似于 Jordan (2005)的晶体模型。该观点认为智慧与年龄无直接关联，在整体上，成年期个体的智慧大体保持稳定。换言之，在成人的生命历程中，智慧既不会系统地减少，也不会系统地增加。该观念是智慧心理学领域的主流观点，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支持(Staudinger, 1999;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Sternberg, 2005; Brugman, 2006; Jordan, 2005)。稳定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逐渐增多，但经验本身不足以生成智慧，需要个体利用它建立更为复杂的知识结构(柏林智慧模式称之为智慧相关知识，wisdom-related knowledge)，因此智慧不会自发地随年龄增加(Ardelt, 2010)，年龄是智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Staudinger, 1999; Jordan, 2005)。

4.1　支持证据

支持稳定论的实证结果主要源自柏林智慧范式(Baltes & Staudinger, 2000)，最著名的智慧外显理论之一。该理论将智慧定义为“有关生命的重要且实用知识(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的专家知识及行为系统(an expert knowledge and behavior system)” (Baltes & Staudinger, 1993)，并主张在实验室情境下通过人生规划(life planning)、生活管理(life management)、生命回顾(life review)任务测量智慧。Smith 和 Baltes (1990)通过人生规划任务研究了青年、中年、老年个体在智慧相关知识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仅仅有一种年龄相关的趋势，但整体上的年龄差异并不显著。后续的三项研究结合了生活管理、生命回顾等任务，亦未发现显著的年龄差异(Baltes et al., 1995; Smith et al., 1994; Staudinger et al., 1992)。

随后，Staudinger (1999)对 4 项基于柏林智慧范式的研究数据(共计 533 名被试，年龄在 20~89 之间)进行了整合分析，发现年龄与智慧(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间的相关不显著(r = −0.07, ns)。此外，智慧水平处在前 20%的个体中，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数量相差无几。Staudinger 从两个角度解释了上述结果：(1)方法学的考量。可能是同辈效应(cohort effect)掩盖了年龄效应(age effect)，此为横断研究所固有。(2)理论上的解释。在成年人的生命历程中，随着年龄的增加，既有促进智慧生成的因素(如：更多的经验，个人成长)，也有妨碍智慧生成的因素(认知处理能力的衰退，对经验开放性的减少，固执程度的增加)，二者的得失大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妨碍智慧生成的因素抵消了促进智慧生成的因素，因此从总体上看，智慧与年龄没有直接联系，在统计上表现为不相关。另外，该研究还显示：个体一旦过了 80 岁，年龄与智慧之间便呈现了某种程度的负相关，这意味着一定水平的认知处理功能是保持智慧稳定的必要条件。不过，由于 80 岁以上被试的样本量过少，尚不足以坚定地得出上述结论。

不仅柏林智慧模式的实验室研究结果(最佳行为测验)支持稳定论，Webster 等人(Webster, 2003, 2007; Taylor, Bates, & Webster, 2011)早期通过问卷进行的相关研究(典型行为测验)亦提供了支持。Webster 将智慧界定为包含 5 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批判性生命经验、回忆/反思、对经验的开发性、情绪管理、幽默)的多维构念，并发现智慧与年龄无关。

4.2　评价

在智慧心理学领域，智慧与年龄关系的稳定论因得到了实证研究的广泛支持而拥簇者众。在历史上，亦有诸多名言(均转引自：Jordan, 2005)与之呼应，如：“智慧不是满头白发可以促成的。” (Menander, 342–292 b.c.)、“除皱纹外，其它任何事物都不会因年长而自然到来，智慧尤其如此。” (Abigail Van Buren, 1918–2013)。

稳定论的核心思想是：整体上讲，成年期个体的智慧是一个年龄独立(age-independent)变量(Brugman, 2006)。在理解稳定论时，有三点需要注意：(1)稳定论，也可称无关论。此“无关”是指

统计上的“无关” (Jordan, 2005), 意味着智慧与年龄没有直接关系, 但年龄充当某些变量的“代理” (proxy), 与智慧间接相关。(2)稳定论并不意味着智慧不能在生命历程中增加, 更不意味着老年人不能拥有智慧。此点下有详述。(3)目前支持稳定论的实证结果均源自横断研究, 最终结论的确定为时尚早。

关于第二点, 值得考虑的是个体差异的影响。尽管整体上看, 智慧不会随年龄自然增长, 但由于毕生发展存在异质性, 对于部分已经在通往智慧的“轨道” (“on track” toward wisdom)上的个体智慧则可以随年龄增长(Glück & Bluck, 2013)。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Ardelt (2010)发现: 那些乐于且有机会追求智慧发展的个体, 其智慧随年龄的增长而提升。Pasupathi 和 Staudinger (2001)则发现: 对于道德推理能力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个体, 智慧与年龄呈正相关。Cheraghi 及其同事(Cheraghi et al., 2015)则发现: 在伊朗, 受文化历史因素影响, 诸如接受更好的教育或在传统社会中做一名男性之类的有利社会条件, 能使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并反思人生经验, 从而有助于其智慧的逐年增长。上述分析意在说明: 在稳定论的框架下, 虽然一般而言智慧与年龄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在特定社会文化因素或个体因素的影响下智慧完全有可能在生命历程中逐年增加。

5 高原论

高原论, 认为智慧与年龄呈非线性关系, 自成年早期开始上升, 在成年中期达到顶峰, 随后开始下降(衰退速度先慢后快, 在老年较晚期迅速衰退)。该观点与近年来发现“成年期个体的智慧与年龄存在二次关系”的两项实证研究(Webster et al., 2014; Thomas et al., 2017)相伴相生。不过, Webster 等人并没有使用“高原论”这一名词, 而是化用了 Sternberg (2005)的术语“混合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观点, 称之为“流体/晶体智力”混合模型(combined crystallized/fluid intelligence model)。该模型认为智慧的发展轨迹类似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综合: 在成年期, 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均呈涨势时, 二者对智慧的增益作用明显, 智慧增速较快; 自流体智力达到峰值后直至中老年期某个时间点(智慧峰值: 高原)之前, 晶体智力上升对智慧的增益作用大于流体智力衰退对智慧的削弱作用, 智慧依然呈上升态势, 但增速变慢; 在此之后, 流体智力衰退(及伴老年相关其他因素)对智慧的削弱作用渐渐大于晶体智力上升对智慧的增益作用, 智慧开始衰退, 衰退速度由慢而快。

5.1 支持证据

Webster 等人(2014)使用智慧的自我评估问卷(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在荷兰测查了 512 名成年被试的智慧(年龄在 17 至 92 岁之间, M_{age} = 46.46, SD = 21.37; 男 186 人, 女 326 人), 结果发现: 尽管智慧总分与年龄的线性相关关系不显著, 但二者呈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 被试的智慧得分在成年中期达到峰值。具体而言, 在量表的批判性生命经验、情绪管理、开放性、幽默等维度上, 均呈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 而回忆/反思维度则不显著。从达到峰值的年龄看, 批判性生命经验稍晚于智慧总分, 开放性稍早于量表总分, 而情绪管理、幽默两维度则与智慧总分大体一致。

根据 Webster 等人(2014)持有的“流体/晶体智力”混合模型, 智慧随生命经验的积累而增加, 在这点上很像晶体智力, 但在生命晚期较早的某个时间点, 由于认知的、身体的、社会资源的限制终将导致智慧的衰减。因此, 在个体的毕生发展历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智慧的峰值。Webster 等人的研究显示这一峰值恰在成年中期(约为 55 岁), 其对此的解释如下: (1)中年期个体处在求取权力、投入社会的巅峰, 其晶体智力、同感能力亦臻于极。(2)身体仍较健康, 认知资源虽不是最佳亦处在较佳程度(如: 流体智力)。基于以上两点, 中年期个体既有更多机会处在需要智慧决策及智慧行为的位置, 也有相应的资源(不管是认知的, 动机的, 还是情绪的)展现其智慧。

Thomas 等人(2017)使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样本得到了与 Webster 等人(2014)类似的二次结果。他们基于 Ardelt (2003)的智慧定义(一种整合了认知、反思与情感的人格特质), 以 1546 名社区成年样本(年龄在 21 至 100 岁之间, M_{age} = 66, SD = 21)为被试开发了 12 题的简式三维智慧量表(3D-WS-12)。在开发过程中, 研究者特别探索了智慧总分与年龄的关系, 使用多项式回归对线性、二次、三次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二次模型是最优模型: 智慧随年龄不断增长并在 50 多

岁早期时达到峰值(对 3D-WS 而言是 51 岁, 对 3D-WS-12 而言是 56 岁), 随后又不断下降。

5.2 评价

高原论是一个有趣且值得深思的观点。尽管 Thomas 等(2017)的样本整体上老于 Webster 等(2014)的研究, 二者使用的测量工具也不相同, 但得到了大体一致的二次(倒 U 型)结果, 为高原论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结果与 Webster 等人(Webster,2003, 2007; Taylor et al., 2011)的早期研究并不矛盾。早年他们确实未发现智慧与年龄存在关联,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Webster et al., 2014): (1)早期主要是从线性关系立论的, 未考虑二次模型, 因此可能存在未检测到的二次关系; (2)一些早期研究的中年被试过少, 仅仅包括青年被试和老年被试。因此, 尝试从二次曲线的角度分析数据, 不仅有望支持高原论, 还有可能对早年支持稳定论的数据进行修正。

此外, 考虑到当前与过去对“中年”的定义不一样, 对早期研究与新近研究进行直接比较不太明智(Webster et al., 2014)。Webster 等(2014)着重强调: 对成年中期的重新定义应予以足够重视。考虑到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身心健康状态的改善, 当代学者认定的老年期起始时间延后了——中年期的结束时间延后了(Karelitz, Jarvin, & Sternberg, 2010)。在此, 我们注意到 2.2 支持增长论的直接证据不够充分, 其取样的年龄峰值不过 56 岁, 在支持高原论的新近研究中恰好是成年中期达到智慧峰值的年龄。因此, 根据高原论的预测, 若继续对 Wink 和 Helson (1997)纵向研究中的被试进行观察, 很可能发现智慧自此衰退的趋势(尽管其测量工具不同于 Webster 及 Ardelt)。

最后, 与支持稳定论的研究一致, 现有支持高原论的研究的一大问题在于: 均是横断研究, 无法排除同辈效应, 有待纵向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6 反思、展望及新构想

6.1 反思与展望

上文主要梳理了有关“成年期个体的智慧与年龄关系”的 4 个主要观点: 增长论、衰减论、稳定论、高原论。一如 Sternberg (2005)所述, 对智慧的不同定义及测量可能导致不同的实证结果。总体上看, 支持稳定论的研究大多来自柏林智慧范式, 将智慧定义为一种专家知识系统, 采用测查智慧相关表现的情境任务, 属于基于最佳行为的测量; 而支持高原论的研究则主要来自对智慧采取人格取向定义的学者, 采用自陈式问卷, 属于典型行为的测量。值得注意的是: (1)从定义上看, 二者虽均有一定优点(汪凤炎, 郑红, 2014, pp.144–147,156–158), 但均未明确道破智慧的实质(汪凤炎, 郑红, 2015): 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智慧的本质, 德才一体方是智慧。(2)从测量上看, 尽管二者均有一定合理之处(一似能力测验, 一似人格测验), 但均存在一定风险, 二者测到的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智慧水平)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3)尽管一直有学者(Staudinger, 1999; Brugman, 2006; Ardelt, 2010)呼吁: 唯有纵向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智慧与年龄”的关系这一议题, 但绝大多数研究仍为横断研究(仅一项纵向研究)。

除前文梳理的实证研究外, 还有学者(Grossmann et al., 2012)发现“文化”调节着智慧与年龄的关系, 以日本人为被试的结果支持稳定论, 而以美国人为被试的结果支持增长论。不过, Grossmann 等所用智慧范式考察的内容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偏向性, 得出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

综上, 在实证层面, 欲探明成年期智慧与年龄的关系究竟为何, 有三项任务最为“紧迫”: (1)对智慧的实质做更深入的统一理解与把握; (2)开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智慧水平测量工具; (3)尽早开展纵向研究或系列交叉研究(开始要早, 故言紧迫; 开始之后急不得, 故加引号)。此外, 在理论层面, 尚有以下 6 个问题值得探讨: (1)智慧之萌发。智慧的萌生期(seeds of wisdom)果真是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 (2)智慧增长模式。为何有些个体的智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另一些则不然? 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3)智慧衰减模式。整体上看, 智慧的平均下降点在何? 是像稳定论所发现的那样在 80 岁左右, 还是如高原论所发现的在 55 岁左右? 抑或是其他年龄? (4)智慧衰减与寿命的关系。个体的智慧或智慧的下降点与寿命(Jeste & Oswald, 2014)是否有关? 能否预测其寿命? (5)智慧水平与年龄的交互关系。从智慧水平上看, 是否具有年龄稳定性的往往是低水平的智慧, 而高水平的智慧更可能在高龄人群中发现? (6)智慧类型与年龄的交互关系。从智慧的类别看, 不同类别的智慧与年龄的关系是否不同? 例如, 物慧的峰值是否早于人慧(陈浩彬, 汪凤炎,

2016)?

6.2 新构想

基于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汪凤炎, 郑红, 2015)、影响智慧生成与发展的五因素交互作用论(汪凤炎, 郑红, 2014, pp.268–276)及过往研究结果, 本文尝试提出基于“个体–情境”差异的“智慧–年龄”关系理论构想: 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受到基于“个体–情境”差异的调节, 此“个体”主要指的是内在因素, 包括五因素交互作用论中的遗传、成熟及主体性, 而“情境”主要指的是外在因素, 包括五因素交互作用论中的环境与教育。从时间上看, 在青春期之前, 个体因素中的遗传与成熟同年龄密切相关, 且对个体智慧的生成与发展影响较大,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学者(Sternberg, 2005; Brugman, 2006)普遍认为青春期及成年早期是智慧的萌发期。

学界的争议焦点在于成年期个体智慧与年龄的关系, 我们认为: 智慧不会随年龄自然增长(无外力干预、不主动追求的情况下, 表现为“稳定论”), 但整体上看, 对于已经走在通往智慧的“轨道” (on track toward wisdom)上的个体(Glück & Bluck, 2013), 智慧与年龄应呈二次关系。此处未使用“高原论”, 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虽然预测智慧与年龄呈二次关系, 但具体的模式不尽如现有高原论的实证结果。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认为, 智慧包含聪明才智和良好品德两大部分, 而聪明才智中又包含着正常乃至高水平的智力、足够用的实用知识、良好的思维方式(汪凤炎, 郑红, 2014, p.195), 对于那些已经走在“智慧之路”上的个体, 在漫长的成年期中上述心理素质中的多数无疑是有望逐年缓慢增上的, 但由于“聪明才智”成分受限于一定的生理基础, 在老年期较晚的某个时间点(高原论发现的则是“中老年期某个较早的时间点”)智慧必然会开始衰退。同时, 此阶段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受情境因素(主要是环境与教育)和个体因素(主要是主体性, 前提是个体业已形成稳定人格)的调节: (1)情境因素的调节。由于成年期个体受环境与教育的影响较大(特别是自青春期结束至形成稳定人格之间), 可以预期: 若个体若处在良好的环境下并接受良好的教育, 自然有利于其智慧的生成和发展(汪凤炎, 郑红, 2014, pp.271–272, pp.274–275), 所以, 整体而言, 身处治世(或稳定的时代)的成年人, 其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呈二次关系的可能性较大; 身处乱世(或剧烈变革的时代)的成年人, 其智慧与年龄的关系呈无关或衰退(“败德”)的可能性较大。(2)个体因素的调节。对业已形成稳定人格的个体而言, 主体性在五因素交互作用论中起着首要的作用(汪凤炎, 郑红, 2014, p.274), 而主体性对遗传、成熟、环境、教育具有统整作用, 亦即四者通过主体性发挥作用(汪凤炎, 郑红, 2014, p.272), 此一时期的个体(若为善的主体性)主动追寻智慧的动机更强, 更有希望充分利用内外在条件对重要且富有意义的生命经验(Yang, 2014)进行智慧式的反思与统整, 因此, 整体而言, 相较于尚未形成稳定人格的成年人, 对于业已形成稳定人格的成年, 其智慧与年龄有更强的正相关(前者呈无关或较弱的正相关, 后者呈较强的正相关)。

根据基于“个体–情境”差异的“智慧–年龄”关系理论, 智慧不会随年龄自然增长, 一定的内、外在条件是个体智慧随年龄增长的必要条件。该理论至少可以给人们三方面的启示: (1)智慧不会自发地产生, 智慧需要人们在人生中着力去追求。在通往智慧之路的正确轨道(德才一体之路)上, 无论是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还是正当壮年的中年人, 都应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 既要注重培育节制、责任、诚信、仁爱与公平公正等良好品质, 也要关注提升智力、“转识成智”、培养良好思维方式、掌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策略(汪凤炎, 郑红, 2014, pp.305–425), 并对自身生命经验进行有效地反思(Weststrat & Glück, 2017), 从而增益自身智慧。(2)老年人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过有智慧的生活, 努力保持智慧不衰退乃至增进智慧, 做智慧的长者。老龄化程度与日俱增的当代, 处在后喻文化下的老年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 冯友兰(2014, p.387)说: 旧时的社会, 事情大多循环, 老年人经验丰富, 但现在的时代日新月异, 就某一方面而言, 老年人的经验已不足用; 在农业社会, 尊高年, 一方面出于道德, 一方面出于实用, 今日则仅出于道德。此处的“出于道德”是指出于社会中“尊高年”(尊老)的道德风尚, 而不是指出于“老年人的德高望重” (虽然后者亦说得通)。既如此, “高年”的内在价值何在? 本文认为老年人的价值在于: 在生命历程中努力追求智慧并保有智慧, 过智慧生活, 做智慧长者, 从而真正地赢得他人的尊重, 并为后来者追寻智慧

提供经验与教训。(3)智慧教育(主要在学校)及智慧干预(主要在社区)的开展对促进个体智慧的逐年增加具有重要意义, 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目前对智慧教育及智慧干预领域的实证研究尚少, 值得深入探讨。本世纪初, Sternberg 等在美国开展的智慧教育运动效果不彰, 亦值得深入反思(陈浩彬, 汪凤炎, 2013)。在智慧教育方面, 汪凤炎和郑红(2014, pp.419–450)提出了智慧教育的一整套基本原则、课程及保障措施, 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 有待后续实践的深入跟进。在更宏大的环境视角上, 不难推论: 社会的智慧(societal wisdom)或智慧的社会(Jeste & Oswald, 2014)亦有助于促进个体智慧的逐年增加。追求智慧的社会, 形成崇尚智慧的风尚, 当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智慧: 结构、类型、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1*, 108–117.

陈浩彬, 汪凤炎. (2016). 人慧与物慧: 基于智慧描述词与提名智慧者的分类. *心理学探新, 36*(3), 203–210.

冯友兰. (2014). *贞元六书(全二册)*. 上海: 中华书局.

汪凤炎, 郑红. (2014). *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凤炎, 郑红. (2015). 品德与才智一体: 智慧的本质与范畴. *南京社会科学*, (3), 127–133.

杨伯峻. (2009). *论语译注* (第 3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杨世英. (2008). 智慧的意涵与历程. *本土心理學研究(中国台湾)*, (29), 185–238.

张仁和, 林以正, 黄金兰. (2014). 西方智慧研究新动态与中庸思维的关系.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8), 212–225.

Achenbaum, W. A., & Orwoll, L. (1991). Becoming wise: A psycho-ger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job*.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2*, 21–39.

Ardelt, M. (2003).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a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Research on Aging, 25*(3), 275–324.

Ardelt, M. (2010). Are older adults wiser than college students? A comparison of two age cohort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7*(4), 193–207.

Ardelt, M., & Oh, H. (2016). Correlates of wisdom. In S. K. Whitbourn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dulthood and aging*. Oxford, UK: John Wiley and Sons.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1993). The search for a psychology of wisdo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75–80.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2000). Wisdom: A metaheuristic (pragmatic) to orchestrate mind and virtue toward excel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122–136.

Baltes, P. B., Staudinger, U. M., Maercker, A., & Smith, J. (1995). People nominated as wi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Psychology and Aging, 10*, 155–166.

Bergsma, A., & Ardelt, M. (2012). Self-reported wisdom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3*, 481–499.

Blanchard-Fields, F. (2007). Everyday problem solving and emotion: An adult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6–31.

Brugman, G. M. (2006). Wisdom and aging. In J. E. Birren, K. W. Schaie, R. P. Abeles, M. Gatz, & T. A. Salthouse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6th ed., pp. 445–476).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Cheraghi, F., Kadivar, P., Ardelt, M., Asgari, A., & Farzad, V. (2015). Gender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ge cohort and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in Iranian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81*, 3–26.

Dennis, N. A., & Cabeza, R. (2008). Neuroimaging of healthy cognitive aging. In T. A. Salthouse & F. E. M. Craik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cognition* (3rd ed., pp. 1–54).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Glück, J., & Bluck, S. (2013). The MORE life experience model: A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wisdom. In M. Ferrari & N. M. Weststrate (E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rsonal wisdom* (pp. 75–97). New York, NY: Springer.

Grossmann, I., Na, J., Varnum, M. E W. Park, D. C.,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0). Reasoning about social conflicts improves into old 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 7246–7250.

Grossmann, I., Karasawa, M., Izumi, S., Na, J., Varnum, M. E.,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2). Aging and wisdom: Culture matt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059–1066.

Jeste, D. V., & Oswald, A. J. (2014).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wisdom: Explaining the paradox of human aging and high well-being.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77*(4), 317–330.

Jordan, J. (2005). The quest for wisdom in adulthood: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R. J. Sternberg & J. Jordan (Eds.), *A handbook of wisd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60–18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elitz, T. M., Jarvin, L., & Sternberg, R. J. (2010). The meaning of wisdom and its development throughout life. In W. F. Overton (Ed.), *The handbook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Cognition, biology, and methods* (pp. 837–881).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Kaup, A. R., Mirzakhanian, H., Jeste, D. V., & Eyler, L. T. (2011). A review of the brain structure correlates of successful cognitive aging. *The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23*, 6–15.

Labouvie-Vief, G. (1990). Wisdom as integrated thought: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52–8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cham, J. A. (1990). The loss of wisdom.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181–2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supathi, M., & Staudinger, U. M. (2001). Do advanced moral reasoners also show wisdom? Linking moral reasoning and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and jud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5), 401–415.

Read, A. E., & Carstensen, L. L. (2012). The theory behind the age-related positivity effec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339.

Richardson, M. J., & Pasupathi, M. (2005). Young and growing wiser: Wisdom during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In R. J. Sternberg & J. Jordan (Eds.), *A handbook of wisd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39–15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öcke, C., Li, S. C., & Smith, J. (2009).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over 45 days: Do older adults fluctuate less than young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24*, 863–878.

Sinnott, J. D.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in adulthood: Postformal thought and its applic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Smith, J., & Baltes, P. B. (1990).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Age/cohort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life-planning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3), 494–505.

Smith, J., Staudinger, U. M., & Baltes, P. B. (1994). Occupational settings facilitating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The sample case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 989–999.

St. Jacques, P. L., Bessette-Symons, B., & Cabeza, R. (2009).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aging and emotion: Fronto-amygdalar differences during emotional perception and episodic memor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15*(6), 819–825.

Staudinger, U. M. (1999). Older and wiser? Integrating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3*(3), 641–664.

Staudinger, U. M., Smith, J., & Baltes, P. B. (1992).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in a life review task: Age differences and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7*(2), 271–281.

Sternberg, R. J. (2005). Older but not wis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wisdom. *Ageing International, 30*(1), 5–26.

Taylor, M., Bates, G., & Webster, J. D. (2011). Comparin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wo measures of wisdom: Predicting forgiven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ith the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 *Experimental Aging Research, 37*, 129–141.

Thomas, M. L., Bangen, K. J., Ardelt, M., & Jeste, D. V. (2017). Development of a 12-Item abbreviated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12): Item select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ssessment, 24*, 71–82.

Webster, J. D. (2003).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0*, 13–22.

Webster, J. D. (2007). Measuring the character strength of wis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65*, 163–183.

Webster, J. D., Westerhof, G. J., & Bohlmeijer, E. T. (2014). Wisdom and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spa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 209–218.

Weststrate, N. M., Ferrari, M., & Ardelt, M. (2016). The many faces of wisdom: An investigation of cultural-historical wisdom exemplars reveals practical, philosophical, and benevolent prototyp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5), 662–676.

Weststrate, N. M., & Glück, J. (2017). Hard-earned wisdom: Exploratory processing of difficult life experie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isd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4), 800–814.

Wink, P., & Dillon, M. (2002). Spiritual development across the adult life course: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9*, 79–94.

Wink, P., & Helson, R. (1997). Practical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ir nature and some longitudinal finding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4*(1), 1–15.

Worthy, D. A., Gorlick, M. A., Pacheco, J. L., Schnyer, D. M., & Maddox, W. T. (2011). With age comes wisdom: Decision making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1375–1380.

Yang, S. Y. (2014). Wisdom and learning from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life experience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1*(3), 129–146.

Older and wis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age among adults

WANG Yuling; WANG Fengy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age is a crucial issue in wisdom psychology.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believe that wisdom is gained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s wisdom and age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re are four generalized views: (1) positive theory; (2) decline model; (3) stable model; (4) plateau model. The former two have been less empirically supported than the latter two. Through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se viewpoints, the present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three most urgent tasks in the empirical aspect and six questions in the theoretical aspect. In addition, we offer a wisdom-age relation theory based on individual-situational differences, which may provide us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age.

Key words: wisdom; age; adult development; aging; wisdom development